

# “我想再拼一次”

——访赛艇双人双划世界亚军曹棉英

王 英

曹棉英是当今世界艇坛一颗明亮的星。在最近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她与广东籍选手张秀云夺得女子双人双桨亚军。自1986年以来，这颗明亮的星突然爆发出一系列令人头晕目眩的光辉：在中国国内，十余次登上艇坛的全国女子单人双桨冠军的宝座，在国外，摘取两次亚运会冠军、一次世界锦标赛冠军，以及汉城奥运会四人艇第四名。各国艇迷，都紧随芳踪，关切赛况，殊不知这颗星的形成和发展还有着一段坎坷而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

近日，曹棉英趁大赛后的间隙回浙江老家看望她年迈多病的双亲，笔者闻讯立即驱车前去采访她。在位于海盐县海塘乡一间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仅28平方米的平房内，我见到了这位令全世界都眩目地璀璨明星。此时的她，一改往日的运动装服饰，身着一套粉红色细小碎花的连衣裙，显得热情、谦和、端壮、文静。当得知我的来意，她便腼腆而又朴实地与我聊起了起来。

## 命运，颇具传奇色彩

许多人也许会认为，大凡在体育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一定会与家庭渊源和熏陶有关，如果说，这种认识有其一定的道理，

那么对于曹棉英而言，则一点关联都没有。

曹棉英，1967年生于浙江嘉兴海盐，与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同为海塘乡人。其父母亲均为当地朴实而勤劳的农民，识字不多。曹在五个兄弟姐妹中虽排行末尾，个子却长得最高为1米76。她从小兴趣便是爱好跑步，在海塘乡当时称前哨小学念书时，便由体育任课老师徐兆良领着她们不分春夏秋冬的跑。放学后，那广阔无垠的田野中的小径便成了她练习跑步的跑道。渐渐地，她的脚步跑向了县运动会的跑道。

1979年6月，曹棉英终于因成绩突出而被选送至嘉兴市地区少体校。在那里，她跟随杨彪老师搞中长跑的训练。以后，她多次参加了上海市郊县五单位田径邀请赛、浙江省少年田径运动会等比赛，成绩均为突出。然而，到了她17岁那年，教师认为搞中长跑再无希望，准备叫她去考大学。就在这时，浙江省赛艇队到体校来招生，经过考试，她被选中了。

1984年3月曹与其他被选上的二三十人一起去省里集训，准备经过集训后再选。那天她刚好与几个小姐妹在教室里嬉闹着打架，省里有个教练凑巧看见，便让她再打一次。曹觉得嬉闹着玩是可以的，但怎么可认真打呢？她不愿意。可教练却执意让她再打。于是，她与小姐妹们竟当真又打了一次。自然她是赢家。就这样，曹被录取了。这次偶然的机遇，决定了她的命运。从此，曹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开始了她迈向体育王国摘取桂冠的第一步。

## 滴滴汗水换来了顶顶桂冠

体育运动事业实际上是一项既光荣又残酷的事业。在从事这项事业的过程中，每个运动员所承受的高负荷的体能训练都是可想而知的。

自曹棉英入选浙江省赛艇队起，她就接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超负荷的体能训练。这是她从未接触过的运动，凭着一份强烈的好胜心她在心里默默发誓：一定要有所作为。正是这个决心，促使她为尽快地掌握基本技能并对枯燥乏味的基本功进行大运动量的训练。说来，她也是幸运的，经验丰富的周琦年担任她的教练。她非常相信周教练的训练手段和方法，对他所制订的训练计划总能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对他所布置的训练量总是百分之百的完成。每天她除了在陆上的身体素质训练外，还要在水上进行四五个小时的划行。当时在运动员中人多话杂，许多人还瞧不起她这个“乡下人”，每当这个时候，曹就在心里说，你不要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就瞧不起人。我就是要抓住机会，搞出点花头来让你们看看。为此，她虽身在杭州，但从不出去玩，不管春夏秋冬，还是严寒酷暑，她不停地练呀练的，每次到了训练的“极限”，她就时常鞭策自己，做为一个运动员要想取得超人的成绩就必须在战胜自我的前提下付出超人的代价。滴滴汗水，终于绽开了芬芳的蓓蕾。1986年，曹棉英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赛艇锦标赛，在这次赛中展露头角，荣登艇坛女子单人双桨2000米冠军的宝座，

并与朱金莲合作，获得女子双人双桨2000米亚军。次年，她又在全运会上夺取了双人艇金牌。初露锋芒的她，就此更加坚定了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为赛艇运动添彩的信念。

### 道路，高峰与深谷连在一起

理想的实现与现实总是有一段距离。1987年，曹棉英由周教练带入国家94 奋战奥运会向国际赛场拼搏，由于各种因素，在半年中，她的训练状况特别差，情绪也受到影响，并且还得了赛艇运动的职业病——痔疮严重出血。按当时的成绩作为队长兼教练的她是不能参加奥运会的。然而，好胜心又在驱使着她，她想，既达到了国家队就要采取拿到奥运入场券。于是，她在周教练的帮助下继续进行训练，每堂课下来，艇座上总是一滩鲜血，这种滋味自然是不好受的，但她终于战胜了自己，从低谷中走了出来。1988年，她在汉城举行的奥运会上取得了双人双桨第五名的成绩。此后，她又先后获得1989年世界赛艇锦标赛四人单桨亚军，八人艇第三名，1990年亚运会四人单桨及八人艇两项冠军，1991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艇第三名，同年又在全国冠军赛上获得三项冠军，一项亚军，1992年第25届奥运会四人单桨第四名，八人艇第五名。1993年世界锦标赛上，她与队友获得了四人双桨冠军，成绩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这以后，为了充实自己，也为了能从理性上认识自己所从事

的这项运动,1995年,曹棉英考入了北京体育学院。她边读书,边训练,将十多年训练中的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从而再去指导实践训练。

曹棉英的训练渐渐转入高潮,特别是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她无论是在体能还是在技术上都发挥良好。然而,不幸的是,那次大赛是由一名外省教练执教,在赛场上指挥失误,使她又一次与冲击奥运奖牌的目标失之交臂。巴塞罗那奥运会上的失败,令曹输得很不服。赛后,她决心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再决一雌雄。

然而,在向目标冲刺的过程中,曹棉英由于年龄的缘故,承受大运动负荷的能力,训练后体力恢复较慢,由此遇到的困难也日趋增多。1995年年底,她由于连续的大运动量训练,血色素下降四克多,各种生理指标反映过度疲劳的现象。在进军亚特兰大前六周,在训练中,她出现耳鸣,昏厥等症状,经确诊为右耳前庭器官障碍。教练陪同她去同仁医院治疗,医生说只能采用激素药物治疗。“这可不行,四年的艰苦训练不能因为这而功亏一篑”。就这样,她放弃了治疗,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病魔,战胜了高负荷训练,战胜了自我。以致在赛前令自己的体重达到了75公斤,对冲刺这个项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在亚特兰大奥运会7月27日进行的女子赛艇双人双桨决赛中,她与广东籍选手张秀云夺取银牌。对此,曹不无遗憾地告诉笔者:“开始时我们曾一度划在前面,但很快被加拿大的麦克贝恩和赫德莱追上,最后仅以

1秒51之差获得银牌”。但是，她又说，她已经尽力了。

## 双亲，仅一条腿却支撑着一个世界

曹棉英是幸运的，然而又是艰辛的。在她人生的背面有着一个艰难的家庭。母亲在生她时，因腿上长了个瘤而被迫锯去一条腿，再加上她白内障严重，眼睛几乎看不清东西。三个年长的哥哥各自成家，姐姐在她上嘉兴体校时出嫁。本来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勤劳忠厚的父亲支撑着，然而，俗话说“祸不单行”，1985年8月25日，她的父亲因车祸而被撞断中枢神经，经多家医院医治，所积存款用尽，也无效果，从此瘫痪在床。这不幸的遭遇，给本来就艰辛的家庭又添了一层阴影。两位年迈的老人从此就靠着一条腿维持着生命。看着双亲艰辛的生活，曹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难过。但是，两老在曹的事业上始终予以坚定的支持。有好多次父母亲病重，曹因训练任务紧而没及时回家探望，心中总有几分难以名状的歉意。每次回家，当曹尽量为他们多干些活时，他俩总说东西太脏，而不让她干。当她说“再脏的东西也是我亲爹亲娘，爸妈就给女儿一个机会尽份孝心”时，母亲则安慰她说：“你只管你的训练，别为家里操心，我们能行。说什么孝不孝的，你能练出成绩为国家争光，也就是为我们争光，这就是最大的孝顺”。那天，曹从亚特兰大返回北京，当她带着胜利的喜悦与母亲在电话里通上话时，突然得知姐姐已于前些日子因故去世，这噩耗犹

如晴天霹雳，想到自己长年在外训练，家中两老全仗姐姐照料，曹悲痛不已。是父母为了不影响她在奥运会上的比赛，强忍着悲痛，到赛后才将一切告诉她。父母的体谅与支持，更令她敬佩不已。还是父母亲这种坚强的性格，成为激励曹道路上的动力，曹说：“没有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我不会有今天”。而两位老人则以女儿的成功作为自己晚年精神上的最大快乐。曹的父亲告诉笔者：“如果没有这个女儿，也许我早已不在人世了，因为有了她，才看到生活的希望，她是我们生活下去的唯一的精神支柱”。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在这一间作厨房，一间作卧室的两间仅28平方米的宅内，一贫如洗，最值钱的恐怕就是他坐的残疾轮椅。然而在这四徒空壁的简陋小屋里，两位仅只一条腿的老人支撑起一个世界级运动员的世界和她的梦。

### “我想有个小孩”

当笔者问道：“你目前最想做的是什么事？”曹竟出人意料地回答说：“我想有个小孩”。她说她很喜欢孩子，与她同在国家队的丈夫吴健雄也有些愿望，而公公婆婆更是如此。并说婚后几年，因长期在外，爱人总是独守空房的日子多。丈夫对她的事业很支持，这份理解能安慰他那颗牵挂的心，然而面对东奔西跑照顾两边老人的丈夫，她感到很惭愧。对此，她说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女儿，也不是称职的妻子。

## 祖国荣誉不忘，拼搏之心不减

随着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结束，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隆重举行奥运健儿凯旋庆功表彰会。曹棉英这位曾与邓亚平等领取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获得者，又在这次会上被记大功一次。在她的故乡，海盐县委、县政府为她专门召开了庆功会，表彰她为祖国、为家乡人民赢得的荣誉特奖励人民币2万元，还专门拨资为其父母改建住房。目前，改建工程正在顺利进行，预计将在国庆前夕完工。为此，她对前去探望她的县委书记费金海表示，她将不辜负祖国和家乡人民的期望，努力创造出好成绩，以报答党和家乡人民对她的关怀。她说虽然年龄不饶人，已近30的她，干体育也已10多年了，有时也真想休息一会儿，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但她认为，如果祖国和人民需要她，她将依旧尽力而为，并仍然渴望幸运之神的降临，让她4年后出现在悉尼的赛场上，为了祖国的荣誉“再拼一次”。

采访结束了。我们在那间简陋的小屋前合影留念。这间小屋很快会不再存在，它将由一幢崭新而漂亮的建筑所取代。然而，我坚信，曹棉英对事业的那份追求是不会改变的，“勤学苦练，孜孜以求”是她人生的座右铭，她一定会向更高的目标奋进。曹棉英，愿您在今后的日子里更加璀璨夺目！

## 县委书记费金海等领导看望曹棉英

1996年8月31日下午，中共海盐县委书记费金海、副书记黄在法，海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沈咏嘉等一行7人前往海塘乡看望趁大赛间隙回家探亲的曹棉英同志。笔者随同前去采访。

在曹简陋的家中，费金海书记亲切地探望并慰问了曹棉英及她的父母。并向曹棉英宣布了县委、县政府就其父母居住的房屋进行资助改建的决定。曹听后，十分激动，她对费书记说：“我和我们全家感谢县委、县政府的关怀……。”并表示一定不辜负县委、县政府和家乡人民的期望，争取在今后的赛场上为国、为家乡人民争光。

1996年10月14日，当我再次随同县委书记费金海、副书记黄在法，海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沈咏嘉等人前往曹棉英家时，只见曹父母的住宅已焕然一新。扩建后的新屋已有100平方米，外围白瓷贴墙，整个建筑在阳光下银光闪闪。曹看到前去探望她的县领导兴奋不已。她激动地讲述了新屋建筑的整个过程，其中插叙的买砖轶事令人听后捧腹大笑。费金海书记在对新居的圆满建成表示真诚祝贺的同时，还对房屋的建筑格局表示赞赏。临走，曹棉英与前去祝贺的县领导和随行人员一起在漂亮的新居前合影，以示留念。

## 奉献仍甘为马牛

——记全国健康老吴侠虎先生

王 自 强

吴侠虎先生是海盐的知名人士，今年九十有五，仍然健步、健谈、健饭。同他接触过的人，都觉得吴老博学多才，性格开朗。

吴老当年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任职，结交了不少文化界的朋友，夏衍（沈端先）、阿英（钱杏）都是知交。阿英先生三十年代曾经到过吴老家乡澉浦，还写了有关的记事文章《澉浦通讯》。明星影片公司拍过一部农村片《盐潮》，胡蝶主演。这部影片由吴老“引荐”，在著名的风景区澉浦南北湖附近拍摄。当地居民以煮盐为生，构筑盐井，设置盐灶，销售中常遭盐警欺压，盐民生活十分贫困。影片《盐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摄制的一部反映盐民苦难生活的故事片。吴老说，拍完《盐潮》，大家兴致很好，临别前夕，几名主要演职员泛舟南北湖上，月明星稀，笙歌荡漾，充满了诗情画意。后来吴老谢绝明星公司的酬劳，倡议在南北湖的长堤上建一座明星亭，以志纪念。这座亭子画栋雕梁，朱栏飞檐，但早已毁于日寇炮火。1983年重建的亭子，远不如原亭的多姿多采，亭址也非当年旧地了。

吴侠虎先生二三十年代在澉浦主持《澉钟》杂志。我父亲缉夫先生在通元编辑《秦溪月报》，比吴老年长五六岁。他们是文化上的世交，时相往来，一直保持到我父亲中年去世。

我生也晚，与吴老建立忘年之交还是在1989年4月间，那时我正参与《海盐县志》的编审工作，在一次会议之后相会于南北湖山庄。在那次宴会上，吴老侃侃而谈当年与我父亲的情谊，还提到一些与我父亲同时代的人和事，勾起我深远的遐思。记得当时《秦溪月报》上连载过长篇“点将小说”，我问起吴老，他证实了这一点。吴老除了主持《澈钟》杂志，参与纂修《澈志补录》，也为《秦溪月报》和其他报刊供稿。1933年所撰《东方大港·澈浦岬》一文，至今仍为史家所引用。那次会面，给我的一个强烈的印象是吴老的一举一动，完全不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耄耋老人，而谈话引用的诗词佳句，如数家珍，滚瓜烂熟，大家惊异他有如此超常的记忆力。近年来，他还为《海盐文史资料》撰写一些考证文章，为研究海盐人文历史提供珍贵的资料。

吴侠虎先生还是一位公认的“南北湖专家”，他为风景区的每一个景点，能够溯源探微，一一道来。他在早年撰有《南北湖小史》稿，每次见面，我都建议他补充修订后公开出版，供旅游者参考。今年8月初，我收到这本由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题签的大作。盖因来得突然，更觉喜出望外。

吴老前年曾发表诗作《九三述怀》，诗曰：“虚生已是九三秋，两袖清风不妄求。世见故乡多后秀，愧无建树屡搔头。欲绍箕裘成梦想，早将书剑付东流。老来但望身康健，奉献仍甘为马牛。”诗作表述了一位老人平生的抱负，既写实，又风趣，这正体现了吴侠虎先生的为人。

吴老关心后学，热心公益，提倡体育锻炼，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去年，吴侠虎先生被评为全国健康老人——国之人瑞，祝愿他在期颐之年再获殊荣。

## 风雨途中心向阳

马飞熊

1958年春，《浙江日报》载黄岩教师向农民捐献拖拉机，海盐教师闻风而动。5元10元，纷纷认捐。当时，我的全部积蓄只有一个余款百元的活期存折。我就认捐100元，当场把存折上交校长徐士英。领到“教师号拖拉机”第一号捐款收据。收据上两方印章，一是海盐中学书记张炳芳，一是文教局会计许品水。后来捐献停止，拖拉机没有买，不知当年的捐款用在何处。

这年秋，《海盐报》总编俞戍生找我绘制共产主义漫画《明天的金海盐》，以第二、第三两个整版发表，寄来稿费10元，我把稿费汇票退回报社。

9月13日，海盐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在横港乡成立。现场叫我用红漆在一块刷好白漆的木牌上写《红旗人民公社》六个大字。接着，应邀为各乡相继成立的人民公社“墙头开花”，绘制《骏马奔驰》和《巨龙腾飞》。奔驰的骏马上，骑着工农兵学商，同举人民公社红旗。腾飞的巨龙上，也画高举红旗的工农兵学商。

11月，海盐并入海宁。

1959年3月15日晚上，徐校长叫我连夜赶到硃石。从通元到硃石，走田间小路。夜幕中，孤身独行，过石泉。到倪土溪庙，无法再前进。找到大队书记肖良观。肖书记派民兵带路。半夜到硃石，寻着县府传达室，敲门叫醒值班员，好心老同志，介绍我去招待所安歇。

第二天得悉，县里17日召开万人大会，要我写大标语。是张家欢打电话给徐校长，叫我16日上午乘船到硃石。宣传部同志责怪徐校长不该逼我单身走夜路。

59年上半年，在硃石东山，为农业展览会画图。下半年，在工人俱乐部布置工业展览会。年底，宣传部办阶级教育展览会，突击三天，陈惠礼部长伴我通宵绘制漫画。腊月二十三日上午，陈部长叫我回家过年。中午徐校长来电话，叫我立即回校。下午回通元，徐校长满面春风，欢迎我帮助公社布置丰收展览会。当晚开工，日夜写画。腊月廿九，任务完成。

晚饭后，徐校长叫我到办公室，突然变脸，命令我明天去沈荡公社报到。在硃石时，曾听人言，教师中之右派，全部集中沈荡劳动。我一直没有接到通知，以为对我格外开恩。谁料大年除夕，徐校长命令我上路。

通元到沈荡，绕道硃石。上午搭乘六里过来的轮船，中午到硃石。去沈荡的船，要等到下午两点半。

在海宁邮局买信纸信封给缙云家中写信。后来回家听娘说，父亲收到那封信时，放声痛哭。

在硖石码头等船，卷缩一角，欲哭无泪。挨到上船时间，见别人都是欢欢喜喜回家客，唯独我孤孤单单落难人。傍晚船到沈荡。公社里，静悄悄。等了好久好久，门口走进一人，是郑永祯，连忙向他报到。

郑永祯曾是机关学校学生，一时没了主意。这么晚了，如何安置我。他沉思片刻，为难地说：“马老师，去新丰吧！”

新丰大队在沈荡镇西市梢，挑着行李，找到大队办公室，门锁着。

天色渐暗，鞭炮声声，除旧迎新，万户欢庆。只有我，孤伶伶，悲戚戚，在这杭嘉湖鱼米之乡的小镇角落，寒冷、饥饿，眼前一片墨黑。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也不知已经几点钟，终于有人来了，是大队干部沈信昌。我说明身份，信昌叫我去“良种试验场”。根据信昌指点，出市梢，摸黑朝西，走过一座小桥，郊野中，一点微弱灯火。向灯火处摸去，是一个牛棚。

放下行李，上前敲门。

“谁？”北方口音，十分耳熟。

“我，老马”。

“哎唷，我的老兄，这么晚了还来！”是翟明坤，海盐中学语文教师机关学校的同事。

这里是“试验场”，有几十亩土地，从各生产队抽调一批农民耕作。尚无村舍。下放此处的李长春、陈思渭、徐俊良是本地

人，回家过年去了。只有翟老师，是河南登封人，回不了家，困守在这郊野牛棚。

我的到来，老翟很高兴，端出一个鱼头，请我吃“年夜饭”。

鱼头一个过大年，

泪水拌饭难下咽。

大年夜，牛棚中，草堆上，和老牛相伴，辗转难眠。

年初一，与翟兄上街，低头过闹市，吃碗小馄饨。

年初二，李陈徐诸兄归队，跟着社员“修公路”。

年初三，公社叫我去画图。连干几个通宵。咯的一声，满口鲜血。

曹静安医师送我去嘉兴。

陈德献大夫确诊我患支气管扩张症。休养半年，转送杭州。

1960年10月8日，浙江中医院胸外科章崧英教授为我切除病肺。出院回缙云休养。徐校长以为我不在人世，注销我的户口，停寄粮票。

1961年12月，海盐海宁分县。康复回海盐，向组织部吾明同志报到。喜悉18名右派摘帽，第一个名字是我马飞熊。

(1996年8月追记)

# 我的酸甜历程

沈梦熊

## (一) 教书育人半世纪

我姓沈，名梦熊，浙江海盐人，生于1911年。就读于浙江省立海宁商业学校（在今盐官），后曾任硖石泰顺福米厂财务工作。但由于学生时代主要在住读的生活中在教师的循循善诱与亲切关怀下由尊师而羡慕教师工作。所以曾在乡开设私塾。课余则研读文史经典著作，并为《上海立报》后又为《海盐民报》与《海北日报》撰写政论文、杂文稿件，以资磨炼。

1933年至上海南洋中学补习科执教。该校系上海著名的南洋中学附属学校，公子哥儿不少。以住读生为主，汽车出进，有的甚至用四个俄罗斯保镖接送。该校主任要我照顾一些知名人士子弟，与小说家张资平、著名京剧演员小杨月楼，中、中、交、农四银行储蓄会会长殷纪常及“法租界”大亨金九龄等子弟住在一起。因为他们常来问功课，所以我不得不多看些书，并到上海职业教育社学习外文，教学相长，得益非浅。

1936年（八·一三）日军入侵上海后，南洋中学成了日本宪兵司令部。我或到市北中小学与哲一中学代课，或为家教（教珠算与日文）。为了谋生，到处奔走。

1940年春，日军进入租界后，不得已携妻回乡避难。当时，

海盐已沦陷，学校全部停办。在家乡父老的信赖与支持下又办起了私校。先后竟有六七十名少儿负笈而来。称私立常慕桥小学。有校徽，学校办得兴旺发达。尽管日伪军经常四出骚扰，但敌来我走，无所畏惧。后闻学生中有高工、研究所所长、大学干部与讲师、经济师与药剂师十余人而高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县长孟铸委任我为通元中心小学校长。当即修复校舍，如期开学。但经费相当困难。该镇镇长等发起为学校募捐，组织十多天越剧义演，但学校只拿到收入的10%。1947年在教师欠薪，一桌住校教师濒临断炊的情形下再赴上海，任市立江境小学教务主任。那时上海有二十多所私立中小学，公校只数十所，但待遇较好，所以公校教职难求。该校教师大多被国民党中委、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与社会局长吕哲湘所安插，两派斗争甚烈。我是市教育局某亲戚介绍的，所以姓吕一派经常找我麻烦。如姓吕的教师说我排课没有照顾，她丈夫（国民党特务，后来逃到台湾）竟双手抚摸着手枪对我大兴问罪之师。这时一位身材魁梧的体育教育闻声而至，坐在旁边佯作看报，以防不测。谁知道，旧社会当教师也会如此艰难。

1949年上海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结束了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生活。我历任肇光中学、市教育局师资训练班、第一、第二速成师范，第四、第五师范教师教研组长，六十四中学副校长，大庆民办中学董事长与育人业余进修学院院长。

1966年6月，众所周知的那场大灾难来临。1967年，我被勒